

教育译著的导入与中国教育近代化

肖菊梅

(浙江大学 教育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28)

摘要:教育译著是近代西方教育理论传入中国的重要形式。通过早期传教士的翻译、教育期刊的介绍及留学生的译编,教育译著随之传入到中国,教育译著的导入加快了近代中国教科书的发展,促进了近代学科分类体系的形成并加快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进程。

关键词:传教士;教育译著;教育近代化

中图分类号:G40-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627(2011)02-0023-06

西方近代教育导入中国的途径不外乎两条:一是通过著述的方式从书本文字上进行介绍、宣扬,其主力是来华传教士,偶尔也包括曾赴洋考察的清廷大员和极少数先觉的中国知识分子;二是通过办学的方式从实践上直接引进“洋学堂”,其主力通常是清代各类新式教育机构的举办者和策划者,主要包括参与教会学校活动的传教士以及参与“洋务学堂”办学活动的洋务大员、外籍教师以及民间绅士等。^[1]由此可知,教育译著实为西方教育理论传入中国的主要形式。在不同时期,教育译著传入的主体、传播内容及传播途径等都会有所不同。

一、教育译著的导入

西书译译为中文,始于16世纪末叶,那时的译著主要以介绍西方的宗教和自然科学为主,其中涉及教育类的译著很少;20世纪初,教育译著开始从日本大量传入;20世纪20年代以后教育译著的传入达到其全盛时期。

(一) 早期传教士的教育译著

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在一大批有开放精神的中国士大夫帮助下,以学术和器物为先导,大量传播西方科学文化知识。据不完全统计,在这次“西学东渐”的二百年间(1582年—1795年),“由天主教传教士翻译的西书达437种,其中纯宗教书籍251种,包括《圣经》、神学、仪式等方面,占总数57%;人文科学的书籍为55种,包括地理、地图、语言文字、哲学、教育等,占

总数13%;自然科学书籍131种,包括数学、天文、生物、医学等,占总数30%。”^[2]显然,西方传教士的初衷或许是以介绍西方科技作为在中国传教的手段,想用科技知识为向导,引领中国人走进信奉天主教的殿堂。在这些传入的著作中,关于教育类的译著很少,其中最具有影响的教育译著主要有:意大利耶稣会士艾儒略(J. Aleni)所著《西学凡》和《职方外纪》、德国传教士花之安(E. Faber)所著《德国学校论略》、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 A. P. Martin)所著《西学考略》、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 Richard)撰写的《七国新学备要》等。根据《西学凡》的介绍,文科包括语文、历史、文学作品阅读等课程;理科则是一种关于哲学、自然科学及社会科学的课程体系。《职方外纪》以叙述世界地理为主,但也扼要介绍了欧洲一些著名大学,如意大利波伦亚大学、法国巴黎大学、西班牙萨拉曼卡大学和葡萄牙科英布拉大学、葡萄牙的埃武拉大学院等。通过这些介绍,有关当时世界一流大学的信息被传入中国。而德国传教士花之安于1873年撰写发表的《德国学校论略》一书便有了非同寻常的意义。该书论述了德国的普通教育和专门教育,专门教育中则以高等教育为中轴,分别论述了德国大学及各类高等专门学校。就其涉及的内容及范围而言,《德国学校论略》堪称鸦片战争后系统导入西方高等教育的开山之作。^[3]清末,时任京师同文馆总教习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

收稿日期:2010-12-10

作者简介:肖菊梅(1977-),女,湖南邵阳人,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国教育史,中外教育交流史。E-mail: xjm_03230@sina.com

(W.A.P.Maltin, 1827—1916)就曾受清政府总理衙门委托,历时两年走访了日本、美国、法国、德国、英国、瑞士、意大利七国,主要对前五国的教育并结合清末中国的教育,作了综合考察和比较研究,写下了《西学考略》一书,为清末创立中国近代教育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参考材料。

1888年6月,李提摩太撰写了《新学》一文,并于次年3月发表在《万国公报》上,后另出单行本,改名为《七国新学备要》,收录于广学会校刊的《新学汇编》之中。据李提摩太称,《七国新学备要》是他在考察了英国、法国、德国、俄国、美国、日本、印度,并参考了欧美各国最新书籍的基础上撰写而成的,其目的在于介绍“天下学校之大略”,并“酌定”“中国学校之新章”。^[4]该文中在介绍七国学校教育时始终围绕着现代三级学校体制这一中心,分别论述了“初学”(小学)“中学”“上学”(大学)的学级编制、课程设置、培养目标等问题。

由上可知,明清之际的教育类译著主要介绍了西方学术的分类体系及其对分科立学的观念、原则、方法,同时也涉及西方的大学及其教育制度的介绍等。这一方面为中国知识阶层了解当时西方学术状况,进而重新审视中国的学术传统,拓宽其学术视野,不无裨益;另一方面也给中国传统教育和学术注入了新的思想因素,成为西方高等教育导入中国的滥觞。^[4]

(二) 日本教育译著的传入

西方教育理论著作的大量传入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基于以下因素:首先是甲午战后,国内的资产阶级维新派认为,日本之所以强大,是因为它在明治维新后以教育为最有效的手段,输入西学,开启民智,培养人才。康有为曾在1898年的《请开学校折》也强调了这一观点:“近者日本胜我也,其国便设各学,才艺足用,实能胜我也。”其次,日本和我国在文化传统、政治体制、地理条件等众多方面的历史亲缘关系,使得清政府相信学习日本是最理想的途径;再次,最重要的原因是清末“新政”,新学堂的兴起亟需大量教科书及其新教育制度、新的教育理论、新的教学方法为指导等;最后,维新运动后留日学生渐多,国内学习日文的人也随之增多,这也为翻译日本教育书籍提供

了便利。有鉴于此,20世纪初,中国掀起学习日本,直接翻译日本著作的狂潮。据《译书经眼录》统计,1902年至1904年,共译书533种,其中译自日本的为321种,占总数的60%,译学校类书共48种,其中译自日本的达39种,占总数的81%。^[5]在翻译日本的书籍中,其中有关教育学的书籍占很大一部分,客观地说,要对这一时期中译日本教育学书籍的数量做出精确的统计,限于资料,是比较困难的。据实藤惠秀监修、谭汝谦主编的《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统计,1896年到1911年,中国共译日本教育类书76种,为历史最高峰,这也可以作为一个宏观上的反映。^[6]这一时期,国人译自日本的教育书籍主要是通过以下三种渠道:

1. 留日学生对西方教育理论著作的翻译和输入

据实藤惠秀著《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一书所录,这时期留日学生翻译和输入的主要教育理论著作有:首先是译文汇编社于1901年编写的英国斯宾塞尔著的《教育论》、法国卢梭的《教育论》、美国如安诺的《教育论》、日本中野礼四郎的《东西洋教育史》、日本加藤弘之的《政教进化论》和日本永江正直编的《女子教育论》;其次是湖南编译社编的《中等管理教授法》(1902年)、(日)嘉纳治五郎《支那教育问题》(1903年)、(日)塚越芳太郎《新国民之资格》(1903年)、《学校实践管理法》(1903年)、(日)中野礼四郎《十九世纪欧洲教育之大势》(1903年)和(日)黛谷五郎《教育学》(普通百科全书)(1903年);另外,会文学社于1903年翻译日本富山房的《教育学新书》、《教育学问答》和《学校管理法问答》;最后,教科书译籍社翻译出版《学校教育模仿图》(1903年)和闽学会翻译出版日本谷山富的《欧洲教育史要》(1904年)。^[7]

以上教育译著仅为留日学生于1901至1904年翻译的一部分,此收录虽不完整,但也说明:日本是我国翻译和输入国内教育学译著最多的国家,而且这些教育译著的传入为清末教育界提供了教育理论基础。

2. 各校延聘的日本教师翻译的教育学讲义

甲午战争后,国内兴办很多近代学校,特别

是清末“新政”，新式学堂数量急剧增加，亟需大量教师，为缓解教师之需，学校聘请了大量日籍教师去各级各类学校任教。据统计，1897年至1909年在华任教的日籍教师有名可查者达465名，其中在各级师范学校任教者达138名，仅两江师范学堂一校，先后聘任日籍松本孝次郎等教习达31名之多。^[8]这些在各地师范学校任教的日籍教师，有些是讲授教育学的课程的，在授课过程中，编辑了一些讲义，传授近代教育理论，据资料可查，主要有以下几本：如松本孝次郎著的《新编教育学》（两江优级师范讲义，1902年）；波多野贞之助讲、颜可铸编辑的《教育学原理》（湖北速成师范讲义从编本，1904年）；江口辰太郎著的《速成师范科教育学讲义》（日本宏文学院讲义，1904-1905年版）；波多野贞之助著的《教育学讲义》（日本宏文学院讲义，1906年）等。

3. 中国自办教育刊物，引进近代教育理论

《教育世界》是中国近代最早自办的教育刊物。1991年，周谷平教授明确提出：作为一门学科的西方教育学的引进“以《教育世界》第9、10、11号（1901年9-10）连载的、日本文学士立花铎三郎讲述、王国维翻译的《教育学》为起点”，认为“目前尚无确凿史料证明有比之更早传入中国的教育学著作”。^[9]随之，其他教育学科相继被该刊介绍并导入我国。据有限资料统计，《教育世界》引进其他教育学科的著作或教材主要有：立花铎三郎著，王国维译的《教育学》；医学士三岛通良著，汪有龄译的《学校卫生学》；田中敬一著，周家树译的《学校管理法》；汤本武比古著的《教授学》；原亮三郎著，沈纮译的《内外教育小史》；木场贞长著，陈毅译的《教育行政》；杉山富槌著的《心理的教授原则》；佐藤善治郎著，沈纮译的《社会教育学》；（英）斐理普麦古那著，（日）一户清方、上冈市太朗译的《实业教育》；（美）槐脱著，旧本大井民吾译的《学校管理法》；（德）乌斐尔著的《校外监督法》；大濑甚太郎、中川延治著的《教授法沿革史》等。

由上可知，《教育世界》通过译介日本教育著作，使西方教育学术术语及内容体系相继传入中国，促进了中国教育学科及各分支学科的产生

和发展。这在当时中国对西方教育理论的介绍寥若晨星、对西方教育思想的系统深入研究几乎一片空白之际，《教育世界》起到了开拓和先锋的作用。继《教育世界》之后，商务印书馆创办的《东方杂志》也刊载了一些教育理论翻译著作；此外，京师大学堂译书局和上海广智书局等出版单位也翻译出版了一些教育理论著作，在此不再赘述。

总而言之，这时期西方教育理论著作不仅传播速度快、数量大，而且传播途径多样化和学科门类化；尽管在翻译过程中也难免有其局限性，如：翻译内容肤浅、翻译质量不高等。但通过这些译著，国人开阔了眼界，并吸收了许多西方近代教育理论，特别是赫尔巴特的传统教育理论，这对20世纪初中国的近代教育理论和实践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同时，国人在译著过程中，也开始自编教育类教材，尽管这些教材数量极少、质量不高，在内容上有抄袭日本的成分，但毕竟也为国人开始自编教材提供宝贵的经验。

（三）欧美教育译著的导入

五四运动前后的中国社会，由于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思想领域一时风起云涌，异常活跃：一方面是封建儒教权威的丧失，另一方面是各种主义、学说的传播。一批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大批留美生的回国，为推动各种思想学说在中国的传播、讨论和研究做出了很大贡献。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杜威来华演讲。此外，又有罗素、泰戈尔、孟禄、推士、麦柯尔、克伯屈、伯克赫斯特等人相继来华指导教育调查、宣传推广教育实验、指导编制教育测验并培训专业人员等，直接参与指导教育科学研究。由此，留学潮流开始转向美国，美国取代日本成为接受中国留学生的主要国家。随之西方教育理论的传入及教育译著的翻译，转向以美国杜威为主导的教育译著的大量导入，同时一些欧美教育译著也被翻译成中文并传入中国。

据平心编《全国总书目》（上海：生活书店，1935年）统计，1912-1940年所出版的新书计20000种中，列出4159种译本，这其中包括哲学、宗教、语言、文学、艺术、史地、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应用科学等科目，而社会科学占这一时期书目总数的25.5%。这些译著来自不同的国

家,但是译自美国和英国的书籍占这时期所有国家书目的 56.4%。^[10]而这时期翻译的教育书籍却主要是来自美国的以杜威为代表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著作。20 世纪 20—40 年代,国人陆续翻译出版的杜威的学术著作有:郑晓沧译的《我的教育信条》(1897)(新教育,1919 年);刘衡如译的《学校与社会》(1899)(上海中华书局,1921 年);郑晓沧译的《儿童与课程》(1902)(上海中华书局,1922 年);刘伯明译的《我们怎样思维》(1910)(上海中华书局,1929 年);朱经农、潘梓年译的《明日之学校》(1915)(商务印书馆,1923 年);邹恩润、陶知行译的《民主主义与教育》(1916)(商务印书馆,1928 年)等。

此外,国人在导入杜威实验主义教育学著作的同时,美国其他一些有影响的教育家及欧洲一些教育家的教育学名著,也在这时期陆续传入中国并翻译出版。如巴格莱著,杨荫庆、童淮、兆文均译的《巴格莱氏教育学》(上卷)(北京共和译书局,1923 年);波特著,孟宪承译《教育哲学大意》(上海商务印书馆,1924 年);桑代克著,陈兆衢译《桑代克教育学》(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 年);桑代克、盖次著,雷通群译《新教育的基本原理》(上海新亚书店,1933 年);夸美纽斯著,傅任敢译的《大教授学》(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 年);赫尔巴特著,尚仲衣译的《普通教育学》(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年);斯宾塞著,任鸿隽译的《教育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 年);(德)拉伊金澎荣著,黄觉民译的《实验教育学》(长沙商务印书馆 1938 年);(苏)品克著,维奇哲夫译的《教育学新论》(辛肯书店 935 年);(苏)平克继支著,尚仲衣译的《苏联的科学教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年)等。

由此可见,这时期引进的教育学不仅有西方国家的(美、德、英、法)也有东方国家(苏联),这种不分资社,兼引并蓄,开阔了国人的眼界,充实了国人编著教育学的底蕴。

除此之外,在广泛学习和研究国外教育学的基础上,国人编撰教育学著作的热情迸发出来,终于迎来了我国教育学史上的繁荣景象。这主要表现在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从量上看,几十家

出版社或机构出版了本国学者编著的七八十种版本的教育学;^[11]从质上看,影响大或较大的著作有:余家菊著的《国家主义教育学》(中华书局,1925 年);舒新城编的《教育通论》(中华书局,1927 年);庄泽宣著的《教育概论》(中华书局,1928 年);范寿康著的《教育概论》(开明书店,1931 年);朱兆萃著的《教育学》(世界书局,1931 年);孟宪承著的《教育概论》(商务印书馆,1933 年);罗廷光著的《教育概论》(世界书局,1933 年);吴俊升、王西征著的《教育概论》(正中书局,1935 年);孟宪承、陈学恂著的《教育通论》(商务印书馆,1948 年)等。

如上所述,这时期教育学译著的传播,从广度和深度两方面都超过了 20 世纪初从日本传入的教育理论。从广度上来说,留美生教育学者引进的西方教育学,其内容涉及普通教育学与分支教育学的各个领域,包括教育原理、教育哲学、教育史、教学论、教育心理学、教育社会学、教育统计学、教育行政、大学教育、乡村教育、中等教育、幼稚教育、师范教育、社会教育、女子教育、特殊教育、教育研究法、比较教育等,如此全面而系统地引进教育学,确实为前人所未有;从深度上看,国内学者特别是留美生教育学者在各自的教育研究领域皆成为有影响的学术带头人,如庄泽宣、陈科美、孟宪承在教育原理方面;罗廷光在教学理论方面;瞿菊农于教育哲学方面;廖世承与中等教育方面;张耀南、艾伟于教育心理学方面;余庆棠于民众教育方面;姜琦、孟宪承于教育史方面;陈鹤琴于幼儿教育方面等,作为一个群体,他们的成就可以看作是中国教育学整体的最高成就,他们成就的取得也是通过对教育译著的吸收、借鉴、融合并最终形成具有中国实际的教育理论。

二、教育译著的导入对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影响

田正平教授认为,教育近代化指的是近代资本主义兴起之后,通过多次的教育改革,学习、借鉴西方教育经验,改造、更新传统教育,努力赶上世界先进教育水平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既体现在教学内容、教育制度、教学方法和手段等物化层次方面,也更深刻地反映在诸如教育理论、教育思想,以至于教育观念、社会心理、价

值取向等精神、思想和心理层面。^[12] 而教育译著作为中国近代教育发展的组成部分,对中国教育近代化产生了极其深刻和全方位的影响,下面就主要从以下三方面来阐述:

(一)有利于中国传统教育向近代教育转型

近代教育的发展首先要有教育制度提供保障,在这一前提下,教学方法、教育理论、教科书等新教育的其它措施才能顺利推行。而教育译著的导入正好为近代新教育的实施提供了条件:首先,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花子安译著的《德国学校论略》,它是鸦片战争后第一部系统的引进西方近代教育著作,该书详细介绍了德国高等教育的体制、义务教育制度的形成及德国近代学制等,这些为中国近代教育制度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其次,20世纪初日文书籍的大量引进,其中包括了日本的教育制度,如学制等直接传入中国,中国的近代学制在模仿日本学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为近代教育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除此之外,20世纪初从日本译介了大量教育理论及教授法的著作,其中尤其以赫尔巴特的教育理论及其中的五段教学法为主;20年代又从美国引进了杜威的实验主义教育理论及译介了大量的设计教学法和道尔顿制的教学法著作,这些对中国传统教育教学产生了较大的冲击,对中国的教学理论和实践也产生很大影响。

(二)加快了我国教科书近代化进程

所谓教科书近代化,意指教科书为适应近代新式教育的发展而产生的变革。它打破了两千多年来封建传统教材的格局,将资本主义教育发展的所需要的教学内容引进教科书,并结合新学制而力图结合儿童的心理特点,使之朝着科学化和大众化的方向发展。^[13] 尽管中国近代教科书的帷幕早在1877年5月,在华基督传教士召开的第一次大会,确定成立“益智学会”即“学校教科书委员会”已经拉开。但这仅仅是对中国近代教科书产生的历史界定,但并不意味着中国近代教科书发源于此时。

在这之前,不论是教会学校还是在洋务学堂,都存在于不同于中国传统经典的教科书,即由西方传人的语言教科书和自然科学教科书。只不过这些教科书还不规范、不普遍、不通行罢了。但是,从这些事实也可证明:中国教科书的近代

化首先是由西方教科书的传入而引发的。而且从教科书的发展角度看,中国近代教科书的产生至少需要具备两个条件:第一是西学的传入;第二是新式学堂的创建。如果新式教科书没有一个容身之处,没有用武之地,它的存在和发展也就没有希望。这两项条件缺一不可。

当时的中国社会已经具备了教科书近代化的条件。首先,明清之际西学在中国开始传播;其次,在1901年,清末开始“新政”,新式学堂有了很大的发展,仅1901年至1903年,全国各地涌现的官立、公立大中小学堂就达680所,私立学堂89所。^[13] 1902年和1904年,清政府先后又颁布了《钦定学堂章程》和《奏定学堂章程》,正式确立了近代教育体制。此时,新式学堂更如雨后春笋,遍及全国。新学堂的激增需要大量的教科书。为解决这一矛盾,《奏定学堂章程·学务纲要》就列有“选外国教科书实无流弊者暂应急用”的专门条目,强调了“目前不得不借用外国成书以资讲习”的原则。这样,新式学堂采用西方教科书便以法令形式肯定了下来。由于崇尚日本教育,所以清末新式学堂创办之时,各学科的教科书基本上都从日本引进。尽管清末学堂大量采用西方教科书实在是迫不得已,但毕竟是中国近代教科书初期的一种必然过度。这也为以后我国教科书的发展提供借鉴。

因此,中国的近代教科书是在大量引进国外教育译著的基础上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同时,教科书的传入改变了知识的传播方式,有利于知识的传播和保存,促进了教育的发展。

(三)促进了中国近代学科分类体系的形成

西方近代学术大致分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类,自然科学主要包括数、理、化、天文、地理、地质、生物学、生理等学科;社会科学主要包括文、史、哲、政治、法律、经济、逻辑学、社会学等学科。中国的传统学术门类主要有经学、小学、史学、算学、天文历法、舆地学及所谓“儒家四学”(义理之学、考据之学、词章之学、经世之学)。^[14] 中西之间即有相似的学科,又有不同的学科。中国的算学、天文历法、舆地学、史学与西方的数学、天文、地理学、历史学科相似,这种相似性有着进一步发展成近代的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和历史学的可能性。但在西

方近代学术门类中有着许多中国学术门类没有的学科,如近代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质学、社会学等。如果没有西学的传入,仅仅依靠传统学术自身的演变,显然难以创造出具有近代意义的这些学术门类。而要把西方学术门类真正为中国的学术门类,这需要有一定的条件去接受和吸收它,那就是通中国通过废除科举、改革书院课程、兴办新式学堂等措施去把西方的自然科学门类“移植”过来。随着中西交流的加强,西方的各种学术门类陆续被引进到中国,促进了中国近代各学科的发展。

教育学科作为引进的学科之一,随着大量教育译著的导入,使得中国的近代教育及教育学科开始形成。随之,教育学的各分支学科也传入中国,加快了中国教育学的发展。

综上所述,教育译著对中国近代教育产生积极的影响。西方的教育制度、教育理论、学科分类等,不仅为当时中国人了解西方教育提供了条件,也极大冲击了传统的思想观念。尤其是20世纪初及其后大量教育译著的导入,为新学堂提供了大量的教科书、新的教育理论、教育方法、教学内容、教育制度、教育观念等,直接促成了新教育的产生和发展,加快了教育近代化进程。

参考文献

- [1] 田正平. 中国教育史研究·近代分卷[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72-86.
- [2] 钱存训. 近世译书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J]. 文献, 1986(2): 3-4.
- [3] 肖朗. 花之安<德国学校略论> [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学版, 2000(2): 12-13.
- [4] 李提摩太. 七国新学备要·新学汇编(卷二)[M]. 上海: 广学会, 1898: 20-25; 26-27.
- [5] 叶志坚. 中国近代教育学原理知识的演进——以文本为线索[D]. 杭州: 浙江大学, 2009: 8.
- [6] 转引钱存训. 近世译书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J]. 文献, 1986(2): 3-4.
- [7] 实藤惠秀. 中国人留学日本史[M]. 上海: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3: 217-230.
- [8] 汪向荣. 日本学习[J]. 社会科学战线, 1983(3): 11-12.
- [9] 周谷平. 近代西方教育学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J]. 华东师范大学报: 教育科学版, 1991(3): 20-21.
- [10] 钱存训. 近世译书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J]. 文献, 1986(2): 7-8.
- [11] 郑金洲, 瞿葆奎. 中国教育百年[M].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3: 10.
- [12] 田正平. 留学生与中国教育近代化[J]. 广州: 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6: 79.
- [13] 王建军. 中国近代教科书发展研究[M]. 广州: 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8: 14.
- [14] 左玉河. 西学移植与中国教育现代学术门类的初建[J]. 史学月刊, 2001(4): 16-17.

Translation of Educational Works and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Education

XIAO Ju-mei

(Institute of Education,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 China)

Abstract: Modern western educational theories were introduced into China mainly by early missionaries' translation, journal introduction as well as international students' translation and edition of educational works.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major works accelerated the development of relevant modern textbooks and the classification system of disciplines in China, thus pushing forward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s education.

Key words: missionary; translation of educational works; educational modernization

(责任编辑 夏登武)